

· 当代西方研究: 和平与冲突问题 ·

南非种族冲突的化解与现代化之路^{*}

潘兴明

(东华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051)

摘要: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未能消弭种族间的尖锐矛盾, 反而引发激烈的种族冲突。在镇压无法奏效的情况下, 南非政府开始了民主改革的进程, 历经沃斯特的政策调整、博塔的改革总战略和德克勒克的改革三个阶段, 较成功地用民主改革的方式化解了南非的种族冲突, 极大地推动了南非的现代化。南非民主改革和现代化进程表明: 各种族间的宽容和解精神是南非民主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 种族关系应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 领袖人物的个人作用在此过程中相当突出和关键; 民主与法制是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各种族文化应当兼容并蓄, 全盘照搬和彻底排斥都是不可取的。

关键词: 民主改革; 种族冲突; 现代化; 宽容和解精神; 南非

中图分类号: D7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7278(2005)06- 0026- 10

南非曾是人类有史以来实行种族隔离最为彻底、严厉的国家。居统治地位的白人和居被统治地位的黑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 进而引发种族间的尖锐矛盾和激烈冲突, 造成黑白文化的猛烈撞击。面对种族冲突的不断升级, 南非白人政权首先使用了强制镇压黑人运动的方法, 其后在无法奏效的情况下, 又开始了民主改革的进程, 历经沃斯特的政策调整、博塔的改革总战略和德克勒克的改革三个阶段, 较成功地用民主改革的方式化解了南非的种族冲突, 极大地推动了南非的现代化, 并为人类解决冲突与实现和平树立了卓有意义的范例。

20世纪 80年代、尤其是 90年代以来, 南非问题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在对南非政府对于民主改革进程作用的研究和评价上, 学界的注意力和研究焦点大多集中在德克勒克时期。《南非史》的作者贝克突出德克勒克的个人作用: “他一旦当权, 就显示出现实主义的精神, 认识到有必要作重大的变革, 并与真正的黑人领导人进行谈判。”而且, “他在 1990年 2月采取的行动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外。”^{[1] (pp. 180-182)} 莱斯特强调德克勒克有别于其前任(博塔)的作用和形象: “他(指博塔——作者注)的继任者几乎立即向世界展现出巨大不同的改革者形象。”并认为原为保守派的德克勒克“个人的改变并不比他对国家政策建议的改变要小”。^{[2] (p. 236)} 学界对沃斯特和博塔时期南非政府的作用很少提及或未能予以客观的评价。汤普森将南非历史上 1948- 1978年称为“隔离时代”, 认为国民党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实现阿非里卡人的种族目标以及白人的种族目标”, 即在南非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实行“阿非里卡化”, 同时“保持白人的支配地位”。^{[3] (pp. 187-189)} 阿特韦尔的看法是: 南非政府在 70- 80年代的改革措施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并没有一个持续的民主改革进程。他说: “尽管政府显然是试图用这些措施来使得白人的统治永久

* 收稿日期: 2005- 07- 03

作者简介: 潘兴明 (1956-), 男, 江苏常州人,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历史学博士。

化,但事实上它们使政府越来越处于守势。主动权不再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只不过是对事件作出反应而已。”^{[4](pp 132-133)} 贝克特别指出:“博塔有关赢取信任的总战略显然不起作用。”^{[1](p 179)} 我们认为国外学界并没有将南非的民主改革作为一个循序渐进的进程并从整体上进行认识和考察,难以对南非的整个现代化进程作较完整和全面的研究和评价。因此,本文将对此进行新的和深入的探讨。

20世纪60年代后期,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的高压统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维沃尔德(Hendrik Verwoerd 1958-1966年任总理)政府对南非境内的不同种族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白人垄断一切政治经济权力,控制社会文化生活,黑人和其他有色种族被剥夺政治权利,受到沉重的种族压迫,黑人反抗运动遭到严厉的镇压,其领导人或被杀被监禁,或流亡国外。

但是,种族冲突并没有停止,黑人的反抗此起彼伏,主要表现在黑人觉醒运动(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的展开和黑人反抗斗争的再度掀起。黑人觉醒运动始于1968年比科(Steve Biko)率领黑人学生与白人学生控制的南非全国学生联盟(National Union of South African Students)决裂,并创建南非学生组织(South Africa Students Organization)。该运动从南部非洲的早期传统和60年代的非殖民化过程以及美国的民权运动汲取思想要素,宗旨是通过唤醒黑人的自尊、自立,抛弃黑人低人一等的观念,解放黑人的心灵,从而使黑人得到解放。运动的成员深入学校和黑人社区,开办各项社区扶助项目,为黑人提供法律援助,在黑人和其他有色种族中发展成员。1972年,比科参与创立黑人大会(Black People Convention),将70多个分散的黑人组织联合起来。比科被推举为名誉主席。黑人大会与黑人工会组织和被查禁的非国大(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和泛非大(Pan-African Congress)合作,导致70年代初黑人反抗运动的复苏。1973年德班大罢工发生,不久东伦敦等地的黑人劳工纷纷响应。1976年索韦托暴动的发生,表明黑人反抗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

尽管1973年的德班大罢工和1976年的索韦托暴动均被镇压下去,但却促使沃斯特(Balthazar J Vorster 1966-1978年任总理)政府重新审视种族政策的取向,决定在坚持种族主义统治的前提下,以较为切合实际和讲求灵活性的方式,对南非种族政策的取向作出重大调整。由此,南非的民主改革进入第一阶段。沃斯特本人在1973年大罢工之后就曾考虑调整政策,包括承认黑人工会的合法性、允许黑人劳工在白人市镇工作和永久居住、采取措施改善黑人教育。^{[11](p 157)} 这些政策设想在他本人或继任者的任期内先后付诸实施。其政策措施集中在两个方面:对内方面着手逐渐放松“次种族隔离”的某些方面,重大举措有:第一,放宽黑人的住房政策,缓解他们的住房困难。^{[5](p 206)} 第二,允许黑人有限度地参与黑人市镇的管理工作。第三,在执行《种族集团住区法》时采取较为灵活的方式,允许一些城市地区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接纳包括黑人在内的不同种族居民混合居住。第四,容许某些传统上由白人垄断的行业对黑人开放。^{[6](p 76)} 第五,军队和体育运动队的大门也终于向黑人打开。对外方面则奉行“向外看政策”,重大举措有:第一,与邻近的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第二,南非向非洲国家提供财政援助,签署贸易协定,并建立航空联系。第三,南非领导人在正式场合公开接待、会见非洲国家的黑人领导人,试图改变南非在种族问题上的负面国际形象。最后,沃斯特还主动出击,走出国门,于70年代中期出访象牙海岸、利比利亚和以色列等国。

沃斯特调整种族政策的意义不仅在于缓和种族矛盾和改变南非的孤立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开始了南非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心环节——南非民主改革的进程,他所做的有意义的尝试,积累

了经验和教训,因此这个阶段是南非民主改革的启动和尝试阶段。沃斯特的一些改革设想,后来由他的继任者变为现实。

南非民主改革的第二阶段是博塔执政时期,其核心是他的改革总战略(Total Strategy)。皮埃特·博塔(Pieter W. Botha 1978-1984年任总理,1984-1989年任总统)是南非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在任政府首脑期间,他提出了改革总战略,一方面延续和推动沃斯特政府开启的改革;另一方面,仍然坚持种族隔离的政策原则,不惜使用暴力手段镇压黑人的反抗,以至于他在下台后不久就不得不面对法庭的讯问。

改革总战略的总体构想是既要以军队的强大武力为后盾,在国内外继续严厉镇压反种族隔离的组织和个人;又要继续推行必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尤其要争取有色人、印度人以及黑人的“信任和信心”。^{[1](p.163)}其目的仍然是维护白人统治和种族隔离制度。从后来实施的具体情况来看,改革总战略包括三大要点:坚决对不适应南非现代化建设和政治稳定的现存制度进行改革;坚决镇压反抗白人统治、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坚决营造一个有利于改革总战略的国际环境。

在执政前期(1978-1986年),国内的局势比较稳定,博塔将改革作为主要任务,坚决对不适应南非现代化建设和政治稳定的现存制度进行改革,采取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大举措。首先,颁布新宪法,设立三院制议会,大幅度修订种族政策,将有色人和印度人纳入享有政治权利的种族范围之内,打破了白人垄断政治资源的局面,这是改变种族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次,承认黑人工会的合法地位。^{[7](pp.231-290)}第三,进一步放松对黑人迁徙的限制。第四,给予黑人某些处理地方事务的权力,准许他们在本种族聚居的市镇、村庄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8]第五,废除某些重要的种族隔离法律和规定,扩大放松种族隔离的范围,改善黑人的处境。

但在80年代中期,南非国内形势发生变化,黑人的暴力反抗和有组织的斗争再掀高潮;博塔不愿改革危及白人的统治权,改革出现停滞;博塔在他执政后期(1986-1989年)实施总战略的重点转移到其总战略的第二个要点,即坚决镇压反抗白人统治、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1986年6月12日,博塔颁布《紧急状态条例》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无限期紧急状态。在此后的一年里,约26000人被拘押,其中许多是未成年人,包括联合民主阵线在内的许多反种族隔离制度的组织被查禁。^{[1](pp.175-180)}

相比较而言,博塔总战略的第三个要点,即坚决营造一个有利于改革总战略的国际环境方面,进展得较为顺利和平稳,并贯穿了博塔执政的整个时期。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南非政府一方面利用自身巨大的经济优势左右它们的经济命脉,避免这些国家成为反种族隔离制度组织的避难地和游击基地;另一方面利用其军事优势,抑制和干涉周边国家反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消除任何公开的和潜在的安全威胁。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博塔政府与英国和美国保持着较友好的关系。只是在博塔政府大肆镇压黑人反抗运动之后,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英美政府才修正原先的立场。简言之,博塔的改革总战略将南非的改革进程带入南非民主改革的新阶段,在南非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其镇压措施造成暴力冲突升级,国内局势几近失控,民主改革进程也陷于停顿。因此,这个阶段是南非民主改革的延续和顿挫阶段。

二

1989年初,德克勒克(Frederk W. De Klerk 1989-1994任总统)接替患心脏病的博塔担任国民党领袖的职务。他将民主改革进程引入最关键的第三阶段,毅然进行具有重大变革意义的改革,导致了以黑人种族为主的多数人统治的建立,同时也结束了白人政权数世纪以来的统治。德克勒克本人也由“一国之主”变为反对党的领袖。对此,贝纳特在《20世纪的南非》中指出:“这

实在是旷世罕见之举,即对于在一个在种族、财富和文化上存有如此巨大差异的国家里,实现象南非这样的民主政治权力移交;或者对于一个非民主的统治集团,在没有出现更为激烈的冲突或外来干预的情况下放弃其权力。”^{[9](p 270)}曼德拉在 1995年对此的评论广为人知,他将这场民主改革及其成果称之为“小小的奇迹”(small miracle)。^{[10](p 200)}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最流行的说法有以下几种:其一,由于南非经济陷入困境,政治上恢复稳定的措施不起作用,德克勒克政府别无选择,只有与非国大谈判,寻求出路^[11]。其二,南非的形势并非严重到无法收拾的地步,经济体系仍能支撑下去,白人政权并没有处在崩溃的边缘。德克勒克此刻采取行动远比未来局势无法逆转时再妥协要主动得多,对白人政权也更为有利。^[12]其三,德克勒克本人的转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德克勒克作出改革决定的原因或动机,也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一是他所在的改革教会(Reformed Church)的宗教信仰是唤起他改革意识的决定因素。^{[13](p 99)}二是出于他在国民党内争取改革派(verligte)的需要,同时也出于他对安全部队高级官员的不信任。^{[14](pp 398-399)}三是由于他希望借此迎合海外的友人,争取国际方面的支持。^{[15](p 135)}

从南非的实际情况来看,南非政府在国内事务上的选择余地日趋减少,面临三大难题:在政治方面,政府对于处理种族关系的一系列举措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 50-60年代的班图斯坦政策,到沃斯特开始的政策调整以及博塔的改革和镇压,只是暂时缓解了这个问题,黑人的反抗在 80年代一浪高过一浪,全面的起义已近在眼前。1989年 9月,开普敦的 300万黑人拒绝工作,35 000人上街游行,其他城市也发生了黑人游行事件,而且,黑人斗争的组织性增强。民众民主运动起了领导作用。而对黑人斗争的高涨,政府的镇压措施往往起反作用。从 60年代以来,白人政权对历次起义的镇压:沙佩维尔事件、索韦托事件、1984-1986年镇压,只在短暂的时间内起作用,而且下一次黑人起来斗争的间隔越来越短,斗争的起点也一次高过一次。可以说,无论是继续镇压,还是进行有限度的改革,所导致的结果必将是黑人反抗斗争的进一步高涨,直到局面完全失控,白人政权被推翻为止,这显然是德克勒克政府极力想要避免的。

在人口方面,黑人人口增长高于白人人口,在全国人口中占有的比例越来越大,政府难以继续无限期地剥夺其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根据政府的官方统计资料,白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由 1936年的 21%降到 1960年的 19%,再降到 1980年的 16%和 1991年的 13.2%。政府于 1988年估计,白人人口的比例到 2005年会再降到 10%。黑人人口比例相应增加,而且黑人的城市化对白人聚居的城市地区也形成冲击。黑人的城镇人口由 1950年的 520万增加到 1980年的 1 060万人。到 2000年,黑人的城市人口达 2 400万(80年代后期的官方估计,并未将多数人统治的因素考虑在内)。这样,城镇黑人与白人的比例将达到五比一。^{[7](pp 10-14)}白人政府需要借助黑人的力量维持其统治,如由黑人治安力量维护黑人地区的治安等等。而且,政府在制止黑人进入白人城镇寻找工作或居住方面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黑人的经济实力上升,对政府决策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黑人作为消费者、劳工和企业主广泛参与国家经济运作。1985年,黑人的净收入占国民净收入的 31.8%、有色人占 8.8%、印度人占 3.9%,白人则占 55.5%。^{[7](p 381)}80年代中期,许多黑人通过接受高层次的教育和培训,跻身于中产阶级行列,一些人进入管理层,另一些人通过一些非正式的经济渠道发财致富。在一些行业中,黑人已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比如黑人城镇的交通运输业。在城镇中,有 80 000辆没有领取牌照的黑人拥有的小型巴士和出租车在运作,另外有 45 000名黑人司机属于南非公交和出租业协会的会员。^{[7](p 49)}

在经济方面,南非经济失去了战后至 70年代的增长势头,GDP的增长率出现下降。1946-1974年,南非的 GDP年增长率为 4.9%,而 80年代的年增长率仅为 1.5%。世界银行在 1987年

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南非的经济增长速度已掉入世界最差国家之列。同时,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国际决算银行在1988年6月的报告中指出,南非的通膨率在1980-1987年之间为15%,列工业化国家的第三位,仅次于土耳其和以色列。^{[7](pp.138-162)}南非经济由迅速增长转而走向停滞,并非与国际经济的走向相一致。西方世界70年代中期因石油危机出现经济危机,但到80年代又恢复增长。所以,南非经济状况的恶化必须从其自身找原因。首先,白人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造成种族关系的空前紧张,白人与黑人之间充满敌意和对立情绪,严重阻碍了经济的正常运作。如对吸引外资极为不利。其次,面对黑人的反抗斗争,南非政府机器空前膨胀,财政负担已难以承受。如政府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80年的21%增加到1989年的32%,净增50%以上。再次,国际社会的制裁进一步收紧,对南非经济的负面作用得到显现。如英国国内民间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压力使得英国对南非的投资,由1980年的60亿英镑下降到1986年的30亿英镑。经济地位的衰退也反映在南非兰特汇价的跌落,1981年1兰特兑换1.36美元,1989年时只兑换0.41美元。

以上情况造成执政的国民党在白人中的权力基础遭到削弱,白人民众对前途日趋失望。在左翼,民主党主张对种族隔离制度进行重大的变革,实行多数人的统治,号召与黑人组织进行谈判。同时国民党的社会基础——阿非里卡人中主张改革的派别影响加大,在国民党中发挥的作用增强。其一,改革派以脱党等方式向党的领导层施加压力。在1987年大选中,3名主张改革的议员脱离国民党,投向左翼政党,其中两人是阿非里卡人。^{[14](pp.372-375)}其二,改革派提出改革纲领,对国民党的竞选和施政纲领施加影响。1989年,兄弟会(Broederbond)发布的“宗旨方针”(conceptual guidelines)在国民党在同年大选中的改革诉求中得到了体现。^{[14](p.400)}其三,改革派为政府的谈判提供了较稳固的社会基础,确保阿非里卡人的左翼对政府的支持。在右翼,主张白人至上的极端分子聚集于保守党的旗帜下,坚决反对改革措施,巩固维护种族隔离制度。他们以暗杀等暴力行动破坏谈判,但由于缺乏有效的领导力量、资源和追随者,其力量尚不足以阻止国民党政府的改革路线,与此同时,普通白人民众对南非的前途日益担忧和失望,纷纷再度踏上移民路,迁居国外。1984年移居国外的白人为8500人,1985年为11401人,1986年为13711人。年轻人中打算出国者比例更高。据调查,1987年在南非罗得斯大学就读的白人男生中,有57%的人决定出国或打算出国。白人民众对国家的效忠程度和责任感出现明显的滑坡。1989年,四分之一的应征入伍者要求推迟服役,15%的应征入伍者逃避参军。同年,38%的白人民众要求免除社区服务方面的义务。^{[11](p.236)}德克勒克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以改革的诉求与白人内部的左翼和右翼争夺选民,恢复白人民众对国家的信心,并且迎合大多数白人选民要求改革的愿望。

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克勒克的改革决不是他一时心血来潮之举。德克勒克本人也断然否认他在1989年发生了任何突然的转变,声称他只是奉行国民党1986年提出的在南非全面实现普选制的政策纲领,只是沿着党的改革之路继续前进而已。^{[10](p.203)}南非当时的形势使得德克勒克政府在与非国大谈判之外没有其他更现实的政策取向选择。同时,我们看到,德克勒克政府在1989年承受的压力并没有达到必须立即改革和交权的程度,因为当时的政局至少要比80年代中期平稳得多。因此,德克勒克在改革的时机上握有主动权和选择权。那么,他为何不是在数年之后改革,而是在上任之后就开始了改革呢?

我们认为,这是1989-1990年间多种因素同时产生合力的结果。从白人统治者一方来看,德克勒克上台执政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显然假如博塔继续掌权,发生德克勒克式改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甚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1989年以柏林墙倒塌为标志的东欧剧变对南非政局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德克勒克认为非国大在意识形态方面已处于下风,国民党有能力在大选中击败非

国大,所以改革不会损害国民党的执政地位。1990年初的民意调查也表明:非国大无法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10](p.212)};德克勒克虽然在80年代具有国民党保守派的色彩,但他实际上是倾向于党内改革派的。他必须不断地改革,才能保住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德克勒克在改革之初确定的目标并不是要交出权力,尤其不能损害白人的物质利益。德克勒克就此强调说:“不要期望我会通过谈判使我自己丧失权力。”^[16]因此,他断定改革的风险要小于改革的好处;最后,德克勒克在1989年的大选中获得了三分之二的白人选民的支持,¹这即意味着对他进行改革的授权,也表达了对他尽早改革的期望。因此,德克勒克在执政之初就下定了改革的决心,他在1990年2月新一届议会开幕仪式上正式宣布说:“1989年9月6日的大选不可避免地使我国走上了剧烈变革之路。”^{[13](p.12)}

从以非国大为主的黑人组织来看,曼德拉支持以谈判的方式结束南非的种族冲突,在民主改革进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在1990年2月11日获释的当天,对德克勒克的改革作了积极的评论:“德克勒克先生在采取实际步骤使局势正常化方面,比任何其他国民党的总统都走得更远。”^{[17](p.26)}实际上,非国大从1985年开始就与政府的代表进行秘密会谈。1989年7月5日,曼德拉还与博塔进行了秘密会见;黑人组织的武装斗争受到东欧剧变的影响,武器、财政方面的援助难以为继,民主德国撤出在南部非洲的军队和顾问,非国大在安哥拉的游击基地也不复存在,因此武装斗争的困难陡然加大;同时,黑人的武装斗争在短时期内没有推翻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可能性,而通过谈判,依靠黑人人口的多数地位,黑人组织有可能实现掌握政权的目标。

由于南非的主要政治力量同意以国家和各民族的利益为重,以谈判方式和平地解决种族冲突和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因此成功地避免了种族间再次发生大规模的内战,有利于种族间和谐关系的建立和国家的平稳发展,实现民族和解和团结。经过不懈的共同努力和作出的重大妥协(即政府承认非国大等黑人组织的合法地位、非国大等黑人组织同意结束武装斗争等),双方终于就民主改革的主要问题达成了共识。1993年6月4日,南非多党派会议终于达成重要协议,确定于1994年4月27日举行多种族全民选举。1994年4月27日,多种族大选如期举行。非国大获得62.65%的选票,在议会中获得250个席位。国民党居次席,获得20.4%的选票,得到82个议席。居第三位的是因卡塔自由党(Inkatha Freedom Party),获10.5%的选票,得到43个议席。5月10日,南非新政府成立,曼德拉宣誓就任总统。政府由非国大、国民党和因卡塔自由党联合组成。两名副总统是来自非国大的姆贝基(Thabo Mbeki,第一副总统)和来自国民党的德克勒克(第二副总统)。布特莱齐(Mangosuthu Buthelezi)出任内政部长。南非的民主改革终于以较为平稳、和平的方式取得成功,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取得了治理国家的权力。所以,这个阶段是南非民主改革的高潮和成功阶段。

三

南非的民主改革是南非现代化历程中意义重大的事件。我们从中看到了黑白两种文化的激烈撞击,看到了世界上最极端最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黑暗,也看到了民主改革、多数统治之后出现的新局面及存在的问题。同时,我们可以从南非的民主改革、以至于南非的现代化中得到以下启示:

首先,各种族间的宽容和解精神是南非民主改革最主要的特征,也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宽容

¹ 1992年3月,德克勒克政府举行白人公决,以确认白人对民主改革的认可和支持。结果,三分之二的白人投票支持政府继续其民主改革和继续与非国大等党派进行谈判。

和解精神是南非民主改革之魂,不仅贯穿了谈判的全过程,而且成为治国安邦的基本国策,是解决种族冲突的一大法宝。各种族选择在谈判桌上相互让步,而不是在战场上—决雌雄。曼德拉在 1990年 9月 8日的一次讲话中大力呼吁各党派摒弃前嫌,实现相互间的妥协,积极推动民主改革进程,他说:“让我们忘记过去。我们大家是兄弟、是姐妹,我们血脉相连。我们的社区处于危险之中,我们的人民每天都在被杀害,如果说存在着任何危及南非前途的因素的话,那就是当国家处于危机时我们还在内讧。”^{[17] (p. 46)}次年 9月,非国大、国民党、因卡塔自由党和其他党派签署《民族和平协定》同意停止内斗。曼德拉在总统就职仪式上又一次呼吁各种族保持和发扬这种宽容和解精神,他说:“我们达成协定:我们将建成这样一个社会,所有南非人包括黑人和白人都能够挺起胸膛行走,内心中不再有任何恐惧,拥有不可剥夺的人类尊严。这就是一个在国内和在国外都建立和平的彩虹之国。”^{[13] (p. 229)}

这一精神还集中体现在新政府处理种族隔离时期涉及白人政权和黑人组织政治暴力事件的问题上。曼德拉政府没有采用其他一些国家采取的清算和惩治的方法,而是提出了如下的政策方针:以民族和解和团结为准绳,以宽容的精神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此,政府于 1996年初成立了著名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委员会的任务是收集、调查和公布 1960至 1994年之间政治暴力事件和行为;听取暴行参与者、策划者的陈述,对主动陈述暴行者予以赦免;对暴行受害者予以补偿和帮助。目的在于防止国家走向分裂,避免种族间的暴力冲突乃至战争,以和平方式确保民主化进程和权力交接的成果,实现民族和解和团结。曼德拉在委员会成立仪式上强调:“所有南非人都面临着要与过去达成妥协的挑战,这样的方式使得我们能够以一个统一的和平的国家来面向未来。……你们的目标就是通过这样行事、通过赦免的方法以确保永恒的和解。”¹该委员会的工作在 1998年告一段落,总的来看,委员会对政治暴力的策划者和执行者采取了宽恕为主、惩治为辅的方针,其着眼点是淡却过去、重视现实、面向未来,促进了种族关系和谐的“彩虹之国”的建设。因此,贯彻宽容和解精神是解决冲突的有效途径之一。

从南非的实际情况来看,宽容和解是解决其种族问题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其一,白人政权的镇压手段和种族主义政策已经在实践中遭到失败,因此必然要寻求不同的解决途径。其二,南非的历史有过宽容和解方面的成功范例,具有借鉴作用和影响力。如英布战争之后,英国政府自 1905年开始采取对战败的布尔人(即阿非里卡人)的宽容政策,较妥当地处理了白人种族内部英裔与荷裔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南非自治领的顺利诞生。其三,南非的国情决定了宽容和解之路是各方可以接受的、对国家和人民最为有利的道路。如在经济方面,由白人控制和管理的经济体系运作顺畅,如用强制的手段予以改变或毁坏,受损失的是所有南非人,南非作为非洲第一富国的地位将不复存在。其四,其他类似国家的教训具有训诫的作用。阿尔及利亚与南非在独立前同属二元型殖民地,但在处理种族问题上采取了暴力的途径,战争对国家的经济造成巨大破坏,政治局面也不够稳定,严重阻碍了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宽容和解精神不仅能够有效地解决南非的问题,而且也有助于解决世界上其他棘手的国际问题或国内问题。如巴以问题,历史已经证明战争和暴力不能解决问题。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已经启动的和平进程充满曲折。在这里,宽容和解精神就显得特别关键,南非的例子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再如津巴布韦土地问题,津巴布韦政府的强制征收和再分配的土地改革政策,引

¹ Address by President Nelson Mandela to the Interfaith Commissioning Service for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Cape Town, 13 February 1996, issued by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发了政府与白人农场主之间和占地农民与白人农场主之间的冲突。目前这个问题已经对津巴布韦农业及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并波及到社会的稳定和对外关系。造成这种紧张状况的原因之一就是宽容和解精神的缺失。因此,我们认为宽容和解精神应当成为国际社会和平解决国际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准则之一。尽管南非的例证不够完善,如仍存在着较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但它在避免了大规模种族冲突和社会动荡的基础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实现了多种族的统治,为人类社会和平共处与和谐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其次,在多种族(民族)共处的国度中,各种族(民族)关系应当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任何一个种族(民族)无论其人数多寡、文化构成如何、社会发展程度高低,都不应将剥削和奴役其他种族(民族)或以牺牲其他种族(民族)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促进自身的进步。如此建立的制度及其政权只能得逞一时,但外逆潮流、内犯民意,终不能长久。而且,各种族(民族)之间关系的重建和文化融合会更加艰难、更加花费时日。

从南非的情况来看,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剥夺与被剥夺的不平等基础之上。在民主改革之前,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白人内部展开,白人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黑人则被隔离于现代化进程之外,政治上无权、经济上贫困。这决定了黑人与白人之间、黑人文化与白人文化之间必然发生激烈的撞击和冲突,两者之间的共存十分艰难,而要实现文化融合则更是海市蜃楼。时至20世纪90年代初两种文化依然泾渭分明、势不两立。“这两种民族主义(非洲人民民族主义和阿非里卡人民族主义)体现出对于我国性质和未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17](p.76)}目前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二元文化的格局依然存在,但相互共存的环境已经大大改善。

第三,领袖人物的个人作用在此过程中相当突出,也相当关键,表明了领袖人物对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力。南非领导人的现实主义路线和政策,为国家找出了一条正确的出路,也为种族关系的重建,实现各种族和解提供了契机。德克勒克在1989年启动富有胆略和远见的民主改革,释放黑人领袖,承认黑人组织合法,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并在白人政权的存在并未受到根本性威胁的情况下,主动地与曼德拉等黑人领袖谈判,表示愿意与黑人分享权力,促成南非历史发生积极和重大转折:即使在1996年率国民党退出政府以后,德克勒克仍安于作为合法的反对党参与政治,并不诉诸暴力的或非法的手段去夺回政权,这些都为南非的民主化建设树立了正面的先例。同时,曼德拉是南非政坛十分杰出的政治家,他从国家的前途、民众的福祉着想,果断地停止反对白人政权的暴力斗争,愿意以合法的途径与政府谈判和分权。1994年执政后,曼德拉更是坚定不移地采取现实主义路线。在政治上,他提出民族和解的口号和政策,努力缓和种族关系,消除种族矛盾,并不寻求复仇或以强硬手段打击政敌。在经济上,放弃原先激进的国有化纲领和口号,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和现状,避免国家经济生活的动荡。结果,非洲其他国家的白人统治结束后,经济便走下坡路的现象并未在南非重演。在社会政策方面,在国家财力允许的合法范围内,大力缩小和消除贫富差距。即使在左翼盟友的压力之下,曼德拉政府仍坚持稳健的、温和的社会政策,绝不通过剥夺措施来实现社会平等。在外交上,曼德拉政府努力与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和平友好关系,与中国建交。因此,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同获诺贝尔和平奖,实为众望所归。

第四,民主与法制是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南非在进行民主改革、权力移交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处于主流的和平、合法方式与处于非主流的暴力、非法方式混杂在一起,显示出南非民主进程的复杂性和欠成熟性。在民主进程中,南非的黑人和白人政治家采取了务实、克制和理智的立场,通过谈判达成分权协议,继而举行大选,成立多数统治和主要政党分权的新政府,成功地实现了白人政权向黑人政府的权力交接。同时,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尤其是黑人不同党派、

不同帮派和不同部族之间的暴力冲突相当激烈,流血事件频频发生。黑人青少年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接受的教育有限,而且在反对种族压迫的斗争中形成一种无纪律性的文化。他们发动示威或抵制行动,对不参与者动辄处死。过去的斗争精神应由克制和宽容和解精神所取代,否则对社会有害无利。他们所表现出的不容异己的专制倾向与民主制度是不相容的。黑人领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予以谴责和批评。图图指出黑人社区的某些方面出现了“大错”,“我们正变得残暴无常,……黑人社区的政治组织为自己的地盘而相互争斗,他们看上去不懂得、其中的一些追随者肯定不懂得民主的真谛在于人民绝对有权自由选择其支持的对象。”^{[18](p.9)}曼德拉大力主张建立以政治宽容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建立一个法制化的社会,他说:“我们作为非国大的成员将继续在建立一种充满政治宽容的政治文化中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大家都认为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等于最恶劣的野蛮世界。我们今天正目睹着一股规模惊人的犯罪浪潮。假如这股浪潮继续下去并一浪高过一浪的话,它将会很快地把南非彻底冲垮。”^{[17](p.83)}但是,尽管存在着这些非主流现象,实行民主与维护法制仍是民主进程和国家建设的主流。

第五,各种文化应当兼容并蓄,全盘照搬和彻底排斥都是不可取的。南非现代化的外来渊源和影响明显,西方文化在其中占有主导地位。南非的现代化由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启动,他们将母国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带到非洲大陆的南端,仿照母国的模式将这个定居地建成一个母国的翻版,将母国文化延伸到这里,其做法与欧洲人开发北美、澳洲殖民地的方式相类似。而南非最终未能成为又一个白人移民国家的原因,是当地的土著人、非洲人人口众多,白人移民始终在人口构成中占少数。白人殖民者在北美和澳洲对付土著人的杀戮和驱赶做法在这里受到限制。西方文化的影响在白人政权统治时期是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南非国家结构和制度俨然与西方各国无异(种族制度除外)。1994年曼德拉为首的新政府成立后,这种状况并未发生重大变化,诸如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经济自由、人权观念等西方思想意识和制度均为新政府承袭。如1996年的新宪法包括一个内容广泛的人权法案,规定公民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受法律保护。曼德拉于1999年2月初面对国内要求恢复死刑的呼声,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并强调“政府不会加入要求恢复死刑的呐喊,或是放弃我们在人权上的成果”。来自西方的基督教早已传播到白人文化圈以外,目前非洲传统宗教的信徒已不到20%。欧洲移民的语言仍是官方语言,黑人除了会说本部族语言外,大都会说英语或阿非里卡语。英语是学校中主要的教学语言。同时,南非并未放弃自己的文化,尤其是黑人文化。南非的官方语言,除了英语、阿非里卡语之外,还有祖鲁语、科萨语、北索托语、茨瓦纳语、南索托语、冲加语、文达语、恩德贝尔语和斯威士语。

南非的民主改革及现代化进程充满曲折和冲突,黑白文化的撞击是其最大的特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经历了近现代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黑暗时代,付出了巨大代价。然而,经过南非各种族人民的奋斗,南非已实行民主改革,化解种族冲突,一个各种族在法律上平等的新国家已经展现在世人面前。

参考文献:

- [1] Roger B. Beck. *The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M].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2000.
- [2] Alan Lester. *From Colonization to Democracy: A Ne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South Africa* [M]. London: I B Tauris & Co., 1996.
- [3] Leonard M. Thompson.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4] Michael Atwell. *South Africa: Background to the Crisis* [M]. London: Sidgwick & Jackson, 1986.

- [5] D. Smith (ed). *Living Under Apartheid* [M]. London: Allen & Unwin, 1982.
- [6] H. Gilmore, L. Schlemmer *From Apartheid to Nation Building* [M]. Cape Town: Oxford UP, 1989.
- [7] *Race Relations Survey* [Z].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 1986.
- [8] A. Lemon (ed). *Homes Apart: South Africa's Segregated Cities*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1.
- [9] William Beinart *Twentieth-Century South Africa* [M]. New York: Oxford UP, 2001.
- [10] Daryl Glaser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South Africa*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1.
- [11] R. Price *The Apartheid State in Crisis: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South Africa, 1975 - 1990* [M]. Oxford: Oxford UP, 1991.
- [12] R. Shrire *Adapt or Die: The End of White Politics in South Africa* [M]. London: C. Hurst & Co, 1992.
- [13] A. Sparks *Tomorrow Is Another Country: The Inside Story of South Africa*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 [14] D. O'Meara *Forty Lost Years: The Apartheid Stat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National Party, 1948 - 1994* [M]. Randberg: South Africa Ravan Press, 1996.
- [15] P. W. Botha *Anatomy of Miracle: The End of Apartheid and the Birth of the New South Africa* [M].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 [16] *African Research Bulletin: Political Series* [Z].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Vol. 26- 6, September 1989.
- [17] Steve Clark (ed). *Nelson Mandela Speaks: Forging a Democratic Nonracial South Africa* [M].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93.
- [18] Sebastian Mallaby *After Apartheid: The Future of South Africa* [M].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2.

Resolution of Racial Conflicts and Modernization in South Africa

—Commenting on the Democratic Reforms by Vorster, Botha and De Klerk

PAN Xingm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Donghua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1, China)

Abstract The apartheid failed to eradicate serious racial conflicts, but touched off vehement racial conflicts in South Africa. After its failure in suppressing the black resistance, the government of the National Party started its process of democratic reform, which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Balthazar J. Vorster's policy-adjustment, Pieter W. Botha's "Total Strategy" and Frederik W. De Klerk's reform. The reform successfully resolved the racial conflicts and dramatically pushed forward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 Moreover, it has testified that the spirit of reconciliation and toleration is the key factor in the success of the democratic reform, that equality should be the principle and the foundation of the racial relations, that the personal role of leaders can be of tremendous importance, that democracy and legal system are the fundamental factors in modernization, and that the co-existence of different cultures should be respected and maintained.

Key words democratic reform, racial conflicts, modernization, spirit of reconciliation and toleration, South Africa

(责任编辑 赵枫)